



# 经济增长

# 走向何方？

世纪之交的全球乐观主义已被对长期停滞的恐惧所取代

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建筑工地上一个工人站在施工架旁。



##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所谓的“新经济”方兴未艾，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极其乐观，这些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但是到了今天，却到处都弥漫着对未来长期停滞的恐惧，长期停滞意味着非常缓慢的经济增长将成为新常态，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尽管众所周知，世纪之交的乐观主义明显不合理，但是今天的悲观主义也同样有些过了。

目前主流增长预测表明，相对于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几十年的增长率来说，美国和欧盟的中期增长会明显放缓（见表）。其中，与1995—2007年相比，预计未来美国和欧洲的实际人均GDP（扣除通胀因素后）的

增长率将减半，甚至更差。而且，在各种情况下，预计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都将出现严重下降。如果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将更加明显，欧洲尤其如此。

另外，美国和欧洲的增长放缓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产生好坏参半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不利影响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求减少上，因此，有必要对依靠出口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重新思考。而且，美欧的增长减缓也可能降低新技术在全球传播的速度。另一方面，欧美的增长放缓也预示着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低实际



## 悲观的未来

对美国 and 欧洲的实际人均GDP和生产率（每工作小时的实际GDP）的短期增长预测都不乐观。

（年增长率，百分比）

	美国		欧盟十五国	
	实际人均GDP	每工作小时的实际GDP	实际人均GDP	每工作小时的实际GDP
1950-1973	2.5	2.6	4.0	4.9
1973-1995	1.7	1.3	1.9	2.5
1995-2007	2.2	2.2	2.0	1.5
2014-2023			1.0	0.8
2016-2026	1.0	1.4		

资料来源：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016；Havik等人，2014；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6。

注：欧盟十五国是指2004年之前加入欧盟的以下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2016年以后为预测值。

利率，从而导致全球资本从发达经济体转而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其带来更多前景光明的投资机会，使其实现持续快速的追赶性增长，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

## 不准确的预测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总是在作出不准确的未来增长预测，或者说总是对改善的生产力表现反应迟钝。长期停滞观点之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就是明显的例子。在193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他说技术进步并不足以产生能够鼓励投资，以及避免出现持续高失业率所必需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事实上，当时距离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时代仅有一步之遥，甚至就在汉森说此话时，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正在高速增长。全要素生产力是指经济增长中不能归因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的部分，反映了隐含的技术和效率等社会因素。然而，在近50年后的1987年，当时正处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前夕，另一位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却哀叹“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的存在，但却少见生产力的统计数据”（见“‘索洛残差’的光辉”，《金融与发展》2011年3月号）。

今天的悲观主义，包括汉森的长期停滞观点的回潮（见本期《金融与发展》，“疲弱的未来”），都只看到了近期的增长表现。因为实证经济分析显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力增长都出现明显的下降，而生产力增长对提高人均经济产出和整体生活水平来说至关重要。尽管有理由认为，数字技术的一些收益还没有

被很好地吸收进GDP和其他国民收入账户中，但专家们都认为美国增长的放缓并不是统计假象，而是实际现象，而且不止是近期全球经济危机的暂时症状。主要原因在于产出的损失，因为今天的实际GDP与早期趋势外推预测值之间的差距，至少都要比大多数对传统国民收入账户中未能识别的消费者福利收益估计值高20倍。但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一线希望。因为大萧条时期的先例显示，在国家创新体系健全的情况下，严重的银行危机并不一定会阻碍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例如，1929—1941年，年均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为1.9%，支撑了其年均2.5%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

而美国未来的收入增长似乎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不乐观。尽管在最近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40年间，实际人均GDP的增长普遍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未来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这一预测的依据在于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通常预示着生产力的下降），有限的劳动人口增长潜力，以及由教育程度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速度的显著放慢。

创新是劳动生产力快速增长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期间，虽然电力、内燃机等重大发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当时美国经济的主要特色还是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增长的广泛扩散，其中包括办公室工作和零售业的重大变革以及工厂机械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信息和通信科技是较短时间内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却无法与早期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相提并论。其实，对美国增长表现的实证分析的核心观点是，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增长的影响现在虽然并未消失，但也远比不上其在20世纪中叶鼎盛时期的作用。例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未来十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的预测值只有20世纪30年代实际增长率的一半。

## 美国增长可以超过预期

但是，这种实证分析从根本上来说只是回顾了过去的情况，而使用前瞻性的方法进行分析则可能会对美国的增长前景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其理由至少有三个。首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机器人有望替代劳动者完成很多工作，包括低工资服务部门的工作，这些工作以前似乎难以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另一波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浪潮可能即将来临，正如一些预测所称，如果在今后20—25年间，40%的工作可以电脑化（Frey和Osborne，2013），那么就可以支持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2%以上。其次，中国的崛起会极大地促进全球研究开发领域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英国是 19 世纪领先的新技术出口国，但到了 20 世纪却转变为需要依赖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引进技术的国家。而在未来几十年，中美之间的类似角色转换似乎仍有可能出现。再次，通过降低获取知识的成本以及大幅扩大数据分析（科技进步的基础）的范围，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也为发现有用的新技术铺平了道路。实际上，研究开发领域已经有了显著的技术进步。

相反，对西欧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追赶性增长的速度，而不是尖端技术进步的速度。从 20 世纪中叶到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欧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明显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中叶到 70 年代初，西欧在此期间出现快速的追赶性增长，在收入和生产力方面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欧洲在此期间的增长速度显著下降，人均实际 GDP 的追赶性增长出现停滞，原因在于工作时间和就业的减少。但是，其劳动生产率却在此期间出现强劲增长，与美国在每工作小时的实际 GDP 上的差距也进一步缩小。然而，到了第三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的生产率增长却跟不上美国的步伐，不但谈不上追赶，反而差距在稳步扩大。其结果是，到了 2007 年，欧盟十五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的收入水平与美国收入水平的比值反而比 1973 年还略有降低。

## 社会能力是关键

欧洲中期增长前景既取决于美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也取决于其追赶性增长能否在长期停滞后重新恢复。经济史学家把社会能力当作决定追赶性增长成败的关键因素。



黄昏时分的城市立交桥鸟瞰，美国加州洛杉矶市。

社会能力可以是激励结构，比如能影响投资和创新决策的监管和税收政策，让企业有效地吸收领先者开发的技术（比如美国）从而提高效率。维持社会能力作为发展的促进因素，通常需要进行制度和政策的改革，比如对资本市场规则和市场新进入者的限制进行改革，但这是一种政治挑战。而且，社会能力也会随着技术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例如，在流水线制造技术变革时期运行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可能会在传播市场服务的信息和技术进步方面存在不足。

## 创新是劳动生产力快速增长的基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欧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其得益于战后重建、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欧洲经济一体化、耐心资本主义（patient capitalism）等因素，其中耐心资本主义是指注重长期实际回报，而不是只关明天股票价格。但是，到了 20 世纪后期，这些因素都已消失，或者至少已大幅减弱。而且，支持西欧经济重建的战后政治协议和社团结构不仅意味着规模更大的社会转移——最终产生了扭曲经济行为的更高额直接税——还给大多数欧盟国家留下了严格的监管制度。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几年，欧盟不仅没有追赶上美国，反而落后得更多，在对这种转变的原因进行的分析中，有一种美国观点广为流传。简言之，该观点认为欧盟国家的竞争程度太低，税收太高，监管太严，因此损害了社会能力。但这种观点很难形成新的转折，因为很多欧盟国家已对此争论了一段时间，认为这些因素并没有阻止（只是可能减缓了）它们的追赶性增长。然而，随着破坏性的信息和通信新技术（其生产力来自于业务重组）的出现，就业保护和产品市场监管的阻碍作用变得更加严重，其原因不是在于欧盟采取了更严格的监管，而是在于现有监管的成本变得更高。在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体中，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力量更加重要，因为正是创造性破坏力量用更新的、更高效的企业取代了低效率的企业和过时的技术，但欧盟的这些创造性破坏力量比美国要弱。而且，很多现存的生产力差距来源于分配资源的低效率（特别是幸存的低生产力长尾企业），尤其是在南欧国家。

## 喜忧参半的未来

对欧盟十五国增长的展望喜忧参半。好消息是美国生产力增长仍在继续（尽管增速放缓），而且追赶性增长仍

有可能。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在进行长期可能增长预测时（使用前瞻性方法，包含了追赶性增长模型，而不是外推近期趋势），预计欧盟十五国的劳动生产力和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在2014年和2030年分别为每年1.6%和1.5%，比欧盟委员会的近期趋势外推的结果更为乐观。

但坏消息是，要想实现经合组织的预测结果，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相关改革的清单并不困难，经合组织和欧盟委员会都进行过此类练习，主要措施包括加强竞争、改革税制、减轻监管要求，并且全面贯彻欧盟公布的建立欧洲单一服务市场的意图，通过消除与不同法规和对欧盟供应商的其他限制有关的贸易费用来实现。而更坏的消息是，此类改革已面临的政治困境，将会因为整个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对市场经济支持的退潮而变得更加复杂，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

总之，虽然美国生产力增长的减速是真实的，并且比金融危机更早出现，但情况不会永远如此。虽然技术进步对未来生产力增长至关重要，但也同往常一样不可预测。即使通过重大的供给侧改革，欧洲可能会比美国增长更快，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可能性似乎并不大。诚然，正如信息和

通信技术一样，欧洲可以奋力开发未来新技术的潜力，但也会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是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教授。

参考文献：

Conference Board. 2016.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May.

Frey, Carl Benedikt, and Michael A. Osborne.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Unpublished, Oxford Martin School, Oxford, United Kingdom.

Havik, Karel, Kieran McMorrow, Fabrice Orlandi, Christophe Planas, Rafal Raciborski, Werner Röger, Alessandro Rossi, Anna Thum-Thysen, and Valerie Vandermeulen. 2014.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Potential Growth Rates and Output Gaps." *European Economy Economic Papers* 535,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6. "An Update to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 2026." Washington, DC, August. [www.cbo.gov/publication/51908](http://www.cbo.gov/publication/51908).



通过聆听  
了解世界

收听IMF播客，了解有关经济  
和发展领域最出色的观点。

登录IMF.org或者你最喜欢使  
用的播客APP。